

# 水与中华区域文化

## ——以吴越文化为例

靳怀

(水利部海委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山东德州 253009)

**摘要** 水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水文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造就了吴越之地发达的水稻文明;河湖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吴越发达的船文化和渔文化。魏晋以后,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江南一改原来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文化渊薮”的硕果。吴越之地民风民俗从尚武到崇文,从刚猛到柔弱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 区域文化 吴越文化 水环境 水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08)04-0005-06

区域文化或称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范畴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是相当精确的地理单元,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逐渐淡化甚至泯灭了其地理学意义,变得疆域模糊,景物易貌,人口迁移,只剩下大致的地理区域,并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积淀在人们的头脑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厚重,博大精深。由于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起源于一时一地,而是通过各自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明时代,最后汇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作用,在神州大地上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对生产方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发生作用,对民族性格发生作用。事实上,地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两种主要因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会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否则人类的历史活动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观

念,而且愈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愈是如此。就中国而言,在降水较丰沛、湿润的东部地区发展起的农耕文化与降雨稀少、干燥的西部地区发展起来的游牧文化,差别甚大。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化与处于四塞之地的三秦文化同样有较大的差异。至于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也各有其鲜明的特色。可以说,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因素和生产方式在内的生活环境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内在机制,特定的自然环境对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的心理素质、性格行为,甚至风俗习惯、生活情态等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生态环境决定文化形态,一定的生态类型与一定的文化形态相对应。

水是自然环境的决定性要素之一。水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以劳动为介质。地理环境由物质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文化类型的铸就奠定了物质基石。各种文化类型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比如,江河水系发达的暖温带——亚热带区域,可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那里的农业最早

得到发展,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进而形成了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的文化特质;临近海洋的地区,拥有“鱼盐之利”和水上交通之便,故工商一般较为发达,相应的,因大海具有纵横驰骋、扬帆远航的条件,容易形成海洋——商业文明的外向开拓精神;草原——沙漠地区,具有流动畜牧的广阔空间;“射生饮血”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游牧文明具有粗犷剽悍、惯于掠夺的性格<sup>[1]</sup>。

中华先民很早就看到了水土气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管子·水地》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

其他如《吕氏春秋》、《礼记·王制》、酈道元《水经注》也都认为,川谷气象对民俗、民风和人的气质、情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嵒巍以嵯峨,其水泱泱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他们都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

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在不同环境下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习俗和价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不同的区域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文化、黄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

## 二

春秋战国时的吴越,主要包括今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

西周时,吴地的居民主要为东夷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今苏南一带;越地的居民主要为百越族,活动的中心区域在以太湖南岸一带。由于夷、越族地理环境接近、生活习俗相通,很早就出现了文化趋同融合的趋势。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其时,都于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吴国与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之间战争不已。“武化”推进了

文化的融合,使得具有近亲关系的远古吴文化和越文化进一步趋于一致,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南沿海区域文化——“吴越文化”。吴越之地为水乡泽国,水文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吴越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降水丰富,水网密布,长江、淮河、钱塘江等大江大河纵贯其中,太湖等湖泽及港湾水塘星罗棋布,这种自然环境为吴越的物质文化创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想条件。与其他区域文化相比,水对吴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第一,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吴越发达的水稻文明。古代的吴越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的条件,使吴越从过去的荒服之地变成了富甲天下的“人间天堂”,从根本上说主要取决于水稻文化的发达。至少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算起,吴越便开始了水稻文明史。春秋时,吴越的稻谷产量已相当大,相比较而言,越地的稻谷产量更高,这主要缘于越地处于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冲积以及海潮回落淤泥堆积而成,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皆有“粮仓”之称。随着江南不断开发,水稻文化也在与时俱进——先是从粗放经营的一熟稻到精耕细作的一熟稻,水稻产量翻番地增长;从稻有早晚之分到一岁两熟,锦绣江南就是这样被打造而成。五代时,吴越“境内丰阜”、“无凶年下岁”。宋代“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南宋更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元代,长期遭受战乱的北方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江南则相对稳定。

明清时期,吴越经济更是高速发展;“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人们对吴越繁盛的极度追捧和赞誉。明清时,吴越经济发展有以下几点显著特征:一是农产品日趋商品化,商业农业长足发展。除了粮食外,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为普遍。棉花和蚕桑成为太湖地区经济作物的两大支柱。在此基础上,丝织业和纺织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化。二是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丝织、棉布加工、造纸、印刷等行业在许多城镇兴起;“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普遍的现象。三是市镇的兴起和乡村城镇化趋势的出现。众多的市镇如众星捧月般拱卫在苏州、杭州、绍兴等中心城市周围。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江南地区市镇的数量多达1383个,城镇化率居全国之冠<sup>[2]</sup>。

值得一提的是,吴越以水稻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与农田水利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北宋著名水利学家邾 曾说过:“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过于苏州。”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故吴越

的农业发达是与水利的兴盛是如影相随的。吴越之地的水利建设,至少肇始于大禹治水时期。进入历史时期以后,水利一直成为吴越农业经济发展的命脉。如春秋时,越国修建了吴塘、富中大塘、练塘、山阴故河道等一批水利工程,使得“水行山处”的越部族开始走出山麓地带,逐步成为北部平原水网地带的主人。东汉时,马援在扬州一带“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后汉书·马援传》)。永和五年(104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了江南最古老的大型蓄水工程——鉴湖。鉴湖周长170多km,上蓄洪水,下拒咸潮,旱则泄洪溉田,使山会平原9000余顷良田旱涝保收。东汉以后,吴越的水利事业更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宋代,吴越之地形成了“五里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规模化、规范化的塘浦圩田体系,成为吴越农业文化的一大景观。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雨量和发达的水利,共同打造出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苏、浙、沪、皖在内的以生产水稻为主的“基本经济区”,谱写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篇章。

第二,丰富的水产资源构成了吴越发达的渔文化和饮食文化。河湖等水域是各种水生动物栖息的家。为了弥补食物的不足和改善伙食,濒海临河(湖)的吴越人很早就从事渔猎生产活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木桨,说明吴越人早在七千年前就能驾船在水上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在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鲤鱼、青鱼、鲈鱼等鱼类骨骼,又表明他们的食物中鱼类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即使到了近现代,在农业已经很发达的情况下,渔业一直是吴越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濒海地区的吴越人也从事海上捕捞业。如浙江海面鱼、虾、蛭、蟹等海产品种类繁多,仅鱼类就有100多种。丰富的水产品促进了吴越人的饮食文化的发达。

第三,发达的水运对吴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吴越之地,河湖密布,出门见水,非舟楫难行,故有“一日不可废舟楫”之说。河湖密布的自然水域和人工运河的开凿,为吴越编织了一条通达四面八方的水上运输网。吴越故地除了具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外,运河的开凿大大弥补了天然河湖的局限性。早在公元前11世纪的商末周初之际,勾吴的缔造者泰伯便在今无锡的东南开挖了一条名为“泰伯渎”的人工运河。春秋战国时期,吴王阖闾为西征楚国,开凿了一条自吴都姑苏通太湖、达长江的“胥溪”。吴王夫差时,又开“胥浦”,沟通了太湖周边天然河川。公元486年,吴国为了北上伐齐争霸,开凿了著名的“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

河。秦汉时,经过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形成了江南运河的雏形。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水运网。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以及后来元朝在南北大运河基础上开成的京杭大运河,南至余杭,北抵涿郡(今北京附近),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南北水上交通大动脉,对吴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水上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吴越造船业的发达。南方吴越人多以“舟代步”,故南人善水战。南方的吴越与荆楚,都是善于制造舟楫的国家,而且水军十分强大。善造舟、善用舟,作为吴越、荆楚文化的传统一直保持下来,这就造就了其深厚的船文化底蕴。从远古的独木舟到春秋时的战船,从小巧玲珑的“乌篷船”到郑和下西洋的巨型“宝船”,以及各种高超的造船技术和遍布江淮两岸的大小船场,无不显示出吴越造船技术的高超。

水网密布的水环境也造就了吴越桥文化的丰富多彩。如苏州古城遍布河渠,到处可见“小桥流水人家”的风采。再如古城绍兴有“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之说,据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城衢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二百二十九座<sup>[3]100</sup>。水乡的桥不仅多,而且造型各异,优美多姿态。如南京十里秦淮河上的古桥,有拱桥、曲桥、斜桥、直桥等,都是建筑艺术的精品;与此同时,不少桥梁内涵深刻,有文化之桥“长干桥”、思想之桥“文德桥”、艺术之桥“七桥瓮”、神话之桥“九龙桥”等,散发出不朽的历史文化光芒。另外,桥梁除了具有沟通孔道和造景功能外,其经济价值亦不可低估。桥梁作为水陆交汇处,往往成为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如苏州城的枣市桥、兴市桥,其桥边都曾是繁华的市场。“船文化”与“桥文化”如同一对孪生姐妹,成为吴越水文化中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

水上交通的发达造就了吴越商品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进步。吴越之地水运畅达,出行方便,为商品的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河流两岸遍布水次码头,这些码头有的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市镇,成为商品的集散地。水运的发达,开辟了文化输出输入的通道。一方面,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浮江泛海而来,不断浸润吴越文化,从而造就了吴越人思想开放、富有进取精神的特征。同时,吴越优秀的文化也借助于水上交通网辐射四方,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吴越人有重商的传统,这也与吴越地处河网地带,水上交通发达,易于经商有关。明清之际,吴越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方。如明代

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对明代中后期江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景象有过细致生动的描写。在柔弱的江浙人中，濒海而居的宁波人以善于经商著称，近代，宁波商帮遍布中国乃至欧美各地。

第四，波光水色营造出迷人的水景观文化。吴越之地，鱼米之乡，到处是楚楚动人的佳山秀水，以水为核心的著名风景区有烟波浩荡、襟带吴越的太湖，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有桨声灯影里的南京“十里秦淮”，等等。在吴越文化中，西湖水文化堪称奇葩。自唐代开始，杭州人修堤疏浚，建闸铺管，使西湖成为重要的水利设施，为杭州地区的城市供水、农田灌溉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经过多年的营建，形成了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曲院风荷等自然文化景观，使西湖成为风景独绝天下的旅游胜地。

### 三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二百州”。在古人的眼里，温柔多情的吴越先民还曾以好斗、勇猛著称。这似乎与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

的确，先秦时期，吴越以戈剑等武器精良闻名天下，刘向《战国策·赵策三》称吴国的宝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吴越的宝剑精良固然由于原料上乘和制作精美，但与吴越人的尚武好勇之风亦有密切的关系。那时，吴越人曾佩带着锋利的刀戈，与人搏杀在荆棘草莽和波涛汹涌的江湖上，他们披发文身，赤膊上阵，一派英雄气概。与此同时，那里还有以铸剑技艺高超闻名于世的干将、莫邪等大匠，更有要离、专诸等好剑轻死的勇士。《汉书·地理志》这样描绘吴越人的性格：“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可见，至迟到汉代以前，吴越人的性格还是比较强悍的。

秦汉之前的吴越人刚强、尚武，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地处“蛮夷”，经济文化落后。由于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在先秦时代以前，中原人一直把吴越之民当作“蛮夷”看待。商末，“泰伯奔吴”立国的故事足以说明当时吴越之地的落后状况。泰伯是周太王古公父的长子，按照长子继位的制度，古公父的王位理由泰伯继承。古公父偏爱幼子季历（包括其孙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为成全乃父的愿望，“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

家》）。《史记》所谓“荆蛮”，泛指东南广大地区。而太伯、仲雍所奔立国之地，就是春秋时的吴国，太伯及其弟仲雍，尊重吴地风俗，断发文身，先后被当地的土著人拥戴为伯。“荆蛮”二字，充分说明当时吴越之地与中原文化比，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上古时期，吴越之地气候湿热，湖沼密布，荆棘丛生，虫蛇鳄鱼等野兽时时威胁着吴越先民的生存。这里虽有丰饶的自然资源，然而因生产力水平的极度落后，开发利用程度非常有限。直到春秋中后期，吴王夫差上台时，还这样描述吴国的状况：“吾国僻远，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所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国力薄弱显而易见。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长江流域土壤粘结，难以用木石——铜石农具耕作，故直至秦汉，长江流域基本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提及汉代江南的情形，说：“土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

第二，战事频仍，环境所逼。其实，就人的本性而言，几乎所有的人的骨子里都是珍惜生命、爱好和平的。春秋时，吴越人好勇轻死，并非天性，而是生存环境所逼。一方面，吴越人既要与“江海为害”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又要抵御其他诸侯国的侵伐。在此过程中，养成了吴越人尚武好斗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环境和形势所逼。

东周以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互相征伐。在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任何诸侯国要想图生存、求发展，必须以军事立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你死我活，不尚武行吗？试问春秋战国时期，哪个国家不崇武尚勇？国家如此，世风如此，老百姓自然不能例外。

长江中游的楚国和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经常开战，逞强斗狠，邻近的吴国和越国之间更是打得不可开交。为了在弱肉强食的纷乱时期不致被别国消灭，进而称王称霸，吴越两国整军经武，扩军备战。吴国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让齐国人孙武“选练士，习战斗”，甚至连后宫的王妃都要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同时大造战船，广铸刀剑，使兵库充盈。越国相对于吴、楚两国而言，相对弱小，先后成为吴、楚的属国。越国因经常受到吴楚尤其吴国的欺辱，早已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两国之间战争不断，胜败反反复复。在“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的情况下，吴越人的尚武好斗之风愈演愈烈。

吴越人的尚武好斗之风，历汉晋而未衰。汉代前期，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名将周亚夫在领教了

吴国军队强悍难敌后感慨道：“吴兵甚锐，难与争锋。”三国孙吴时期，吴越人的尚武精神虽较前有所减弱，但遗风犹存。在汉末天下大乱的群雄竞逐中，东吴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与吴人的强悍不无关系。

## 四

东晋以后，吴越故地民风发生了显著变化——迅速从刚转柔，从尚武转为尚文。这种嬗变，与中原人的大量涌入和先进中原文化植入，从而导致生产力水平提高、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海盐令鲍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遭到晋军主帅刘裕的拒绝，理由是“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沈约《宋书·武帝纪》）。到了南朝，“南人怯懦，岂办作贼”（沈约《宋书·顾恺之传》）已成官场定论。

到了宋代，民间尚武之风消失殆尽。苏轼《表忠观碑记》称江南“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范成大《吴郡志·风俗》也说：“本朝文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惟其所谓尚礼、敦庞、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化、移风俗者与？”至明清，吴越之人“敏于习文，疏于用武”之风更盛，民性也极为柔弱。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南宋以后，中国科举考试的主角无疑是江南吴越人。明洪武四年（1371）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间，状元、榜眼、探花和会元共计244人，其中以江南为主的南方人计215人，占88%；整个北方地区计25人，仅占12%。清代114名状元中，江浙两省69人，占全国的69%<sup>[3]</sup> 190-192。

“绍兴师爷湖南将”。在遍地书香门第的浙江绍兴，男孩子一生来就被家里寄予厚望，稍长一点便被送到塾馆里读书。然后便是参加科举考试。即使考不中功名，做不成文官，大多数也要“入幕”做师爷，他们除了替所依附的官僚出谋划策外，还要替他们管理刑名、钱粮、文书等事务，故清代有“无绍不成衙”之说。

江南才子如钱塘江潮般奔流不息，令人应接不暇，其中不乏重量级的大家，以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的浙江为例，就有：王国维、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太炎、鲁迅、周作人、茅盾、蔡元培、郁达夫、徐志摩、丰子恺、马一浮、夏衍、艾青、戴望舒、马寅初、沈尹默、范文澜、吴晗、竺可桢、钱学森，等等。

如今，一提吴越之地，人们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锦绣江南、鱼米之乡、柔丽清婉、灵山秀水、才子佳人

等字眼，普遍的结论是：吴越是富饶美丽之乡，吴越是才子佳人的渊薮，吴越为工商业发达之所。但吴越人柔弱，不剽悍，不豪放，舞不动鬼头大刀，喝不动白干烈酒，难以仗剑横行天下。

吴越之地民风民俗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应该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江南水土资源十分丰富，一旦得到有效的开发，便迅速成为富庶之区，而经济的发达必然会促进文化的进步，进而对民风民俗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如果说秦汉以前江南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一带，那么，魏晋以后，伴随着避乱的北方人源源不断的南迁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涌入，原本水土资源丰富的江南得到了充分地开发，并迅速成为发达的“基本经济区”。六朝以后，吴越的生产力水平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北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开始出现了建都长安、洛阳一带的朝廷财富和粮食“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的局面。南宋以后，江南经济开始全面超过北方。

富庶的江南，良好的生态环境，滋润的生活，解除了文人士子的后顾之忧，为他们读书求学、从事学术研究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南宋以后，江南日益富庶，不但豪门大户多，而且小康之家更是比比皆是，这就为江南人上学读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不像北方许多贫瘠之地，男孩子一生下便被当作劳动力看待，稍长便要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能够跨入学堂门槛的孩子寥寥无几。有了雄厚的物质支撑，有了闲暇的时光，尚文之风日益盛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长江横亘南北，为江南的社会安定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社会繁荣昌盛的基本保证。论及江南一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应该说长江这条中华第一巨川功不可没。滚滚大江，汹涌澎湃，成为隔绝南北交通的天然鸿沟，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打到长江北岸大多就会望而却步。一旦北方少数民族有足够的力量打过长江，尚文柔弱的江南王朝大多会望风而降，由于不会拼死抵抗，所以江南经济社会的破坏程度远比中原要轻得多。

自魏晋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北方战乱不已，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铁蹄屡屡踏入中原大地，到处萧条、衰败的景象。而江南一带，由于有长江天堑为屏障，不论是六朝时期的江南，还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南唐，由于鲜有战争，江南在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经济繁荣。长期与战争隔绝，富庶而安逸的生活，对人的性格影响是深刻的，久而

久之,憎恶战争、崇文重道的观念便成为吴越人的“集体无意识”。

第三,北方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为吴越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吴越民风的转变。追溯起来,吴越一带崇文好礼之风发端于泰伯、仲雍奔荆蛮建立“句吴”。东晋南渡后,北方中原的先进文化伴随着如潮水般的移民涌入吴越,并很快在这方沃土上生根发芽。“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北方中原文化扎根江南以后,便与江南的好山好水相契合,一改江南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文化渊薮”的硕果来。很快,江南形成了文人云集、文教日盛的景象。

由于北方世家大族之家本来文化素质就很高,加之江南相对安定的局面和江南好山好水浸润,使得他们更加推崇清议,以吟诗作画和谈玄论道为高雅,鄙视武人,不肯屈志从戎。他们约束子弟,不使习武,偶有好武者,则被人轻视乃至被看作败坏门风。更有甚者,这些世家大族还自恃清高,耻于与将门子弟联姻。武将功臣子弟,亦不以父辈的显赫军功为荣,甚至以之为耻。对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曾评论道:“南朝轻武人,晋桓温之贵重,而谢奕犹呼为老兵,王述亦呼为兵。”那些清高之士,连桓温这样的位高权重之人都不放在眼里,其他武人更不在话下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层崇文抑武,民间也就会尊文崇道;上层怯懦柔弱,下层百姓也就不再“轻死易发”了。

第四,优越的水乡环境,是塑造吴越人机敏、精巧、文弱性格的重要因子。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水土等自然环境对人体、人性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尤其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能力极低的古代。一是江南水、土、热资源丰富,水田肥沃,只要耕耘便有收获。吴越人发现,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从来“酬勤”,不像北方,收成好坏主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与此同时,随着大批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自然繁衍,东晋以后吴越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逼得人们必须通过精细化耕作,才能打到更多的粮食及其他物产。在这种生存条件下,吴越人通过兴修水利和辛勤耕耘,收获着“水土”给予的最大回报。久之,这种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必然影响到生活方式,从而也造就了江南人的心思的细密,心思和技术的精巧。心灵手巧的江南不但出能工巧匠,也出艺术家,如徐渭、吴昌硕、徐悲鸿、黄宾虹等。直到今天,江南的手艺人,如木匠、泥瓦匠等,他们做出的活计一般都比北方的同行“地到”得多。二是江南的天气温暖湿润,物产丰

富,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可食,特别是鱼虾等水产品更是餐桌上的常物,这就对人的智力发育大有裨益。相对北方而言,地处水乡泽国的江南人副食则以水生动物为主,陆栖动物为辅;“饭稻羹鱼”,道出了吴越一带饮食文化的特点。“楚越水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捶叠包裹,煮而食之。”(《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各种鱼类及螺、蚌、蛤、龟、蛇等都是吴越人喜欢的食物,这种习俗保留至今。因而吴越人从小就大量吸收蛋白质以增强脑力,日久自然头脑聪灵。三是水的滋养。智者乐水,水对人的性格塑造和智力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江南之地,河渠密集,池塘棋布,到处都是小桥流水。江南地区号称水乡,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建造房屋也躲不开水,许多民居都是临水而建。与此同时,江南气候湿润,降雨频繁,而且较少急风骤雨,多为细雨蒙蒙。灵山秀水的优越环境,使吴越人饱受山水之灵气,于是人的躯体被秀水、细雨浸得柔弱秀气,性格被浸得细腻精巧,头脑被浸得精明灵光。另外,水乡文化特性还渗透到吴越文化的深层结构,吴语的柔软、吴歌的委婉清丽、吴戏的柔婉曼妙等,无不彰显着水的灵性和神韵。

于是,在香山软水、闲适生活以及先进的中原文化共同滋养下,吴越人尤其是男子便在悄然间发生了蜕变——他们不再孔武有力,不再喜欢打打杀杀。他们追求富裕安逸的生活,他们热衷于读书入仕……女人则被塑造得娇小秀美,温柔多情。

但凡事都利弊并存。锦绣江南出才子、出书生,但这些身子骨酥软擅长写八股文章的官僚文人并不见得具有良好的政治才干,他们中间胆识不凡、能力卓越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迂腐之辈倒是大有人在。中国历史上许多状元、榜眼之类的考试高手出自江南,而治国安邦的杰出人物却少之又少。另外,江南人大多文弱,血性不够,一旦有强敌打来,他们大多会选择放弃抵抗,打起白旗投降。这也是东晋以后,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多短命、多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30.
- [2] 王卫平. 吴文化与江南社会研究[M]. 北京: 群言出版社, 2005: 299.
- [3] 张荷. 吴越文化[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